

江西历史人物研究系列

曾巩评传

曾巩先生文集序

宣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適

疏其文章之慄熟為奔放雄渾瓌偉若三

猛獸之挾怒江湖之下波濤煙雲之安

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

江西高校出版社

277

普珉评传

王琦珍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北京西路77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昌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875 字数200千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81033—001—2 /I·1 定价：3.50元

目 录

第一章	曾巩的生平与文学道路·····	(1)
第二章	曾巩与王安石变法·····	(28)
第三章	曾巩的文学理论·····	(47)
第四章	曾巩散文的风格·····	(70)
第五章	曾巩的散文艺术·····	(96)
第六章	曾巩散文的艺术渊源·····	(120)
第七章	曾巩的诗歌成就·····	(142)
第八章	曾巩的诗歌艺术·····	(162)
第九章	曾巩的影响与评价·····	(188)
第十章	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216)
附录一	曾巩年谱·····	(244)
附录二	方志所辑曾氏族人诗文·····	(269)
后 记	·····	(276)

第一章 曾巩的生平与文学道路

在中国文学史上，曾巩是位有突出成就的作家，他以自己的艺术成就，一度显赫于宋代文坛，并被后人列为唐宋八大古文家之一。

曾巩，字子固，自号“南丰先生”，宋代江西建昌军南丰人，生于一〇一九年（宋真宗天禧三年），卒于一〇八三年（宋神宗元丰六年）。

曾巩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鼎盛而向衰落转化的十一世纪中叶，表面的繁华与承平，毕竟掩盖不住那已经明显出现的衰败征兆。江河日下，百感苍茫。面对这种时代的总趋势，有抱负的政治家们和企望有所作为的开明君主，屡屡力图通过革新朝政来扭转局面。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十一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就这样充满着革新与守旧的矛盾、交织着沉沦与奋起的抗争。而一大批文坛新人，便在这动荡的背景中崛起，并且成就了他们的事业。曾巩则是其中一位卓有建树的大家。

曾巩的成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诸如家学渊源、师承关系、取法态度、社会环境条件乃至个人的秉性气质等等。曾巩的文学创作，也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出现过三次高峰，而这又与上述诸种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下面，我们将曾巩六十五年的坎坷人生和文学道路，分成五个阶段进行叙述。

一、“嗟予计真不自料，欲挽白日之西颓”

——意气风发的青少年时代

曾巩出生在一个世代书宦的家庭里。如果追溯得更远，穷本究源地算起来，在曾氏家族史上，还出现过几位颇值得一提的人物。

曾氏始于郾（今山东省嶧县境内），春秋之际，为莒所灭。其太子巫仕于鲁，去邑（“邑”）为“曾”。巫生阜，阜生皙，皙生参。“东鲁春风‘吾与点’”。曾皙和曾参都是孔门的高足与传人。不过，曾巩一生为人谨慎，他虽然始终以正统儒者自居，但对家族史上的这段光荣，却向来不去炫耀。但他所以决心“况排千年非，独抱六经意”（《写怀》之二），坚持“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则与这种家世可能有很密切的关系。

曾氏占籍南丰始于唐末，其一世祖曾洪立仕唐为金紫光禄大夫令南丰。此后，二世祖曾延铎仕唐为右散骑常侍，三世祖曾仁旺为尚书水部员外郎，都不太显要。曾氏家族的崛起始于宋初，自曾巩祖父曾致尧算起，七十七年间，及进士第者十七人，解试十人，以神童召试舍人院一人。到曾巩兄弟辈时，是其全盛时期。此后，也就日见式微了。

曾巩从这个家庭中所受的濡染，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为人的耿介坦诚与勇言得失的精神。这主要得之于曾致尧。曾致尧字正臣，宋太平兴国八年进士，拜著作佐郎、秘书丞、转运使、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是一位敢于直言批评时政，而“以耄簪终”的人物。《南丰县志》所记的

一则传闻即可见一斑：“初，致尧尝宴见，太宗从容语及内帑充牣，甚自喜。时方忧旱，致尧即奏对曰：‘未及江南一夜秋雨之为富也’。帝为之动容。”所以，在抚建属地，曾氏历来有“秋雨名家”之称。曾致尧这种貌似迂阔而实则耿介的性格，在曾巩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曾致尧歿于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一〇一二），在曾巩出世前七年。他的这些影响主要是假之于遗著及亲旧间的传闻。曾巩终其一生，尤为崇敬其祖父，不只褒其文集亲为之后序，反复称颂先人这种“勇言当世之得失”的精神，而且请当时的大手笔欧阳修为作神道碑铭，这都可见曾致尧在其心目中的地位。

其次是政治主张。这主要得之于其父曾易占。曾易占官阶不高，只做过几任知县，但却是一位颇有政治眼光与耿介风骨的人物。他曾上书仁宗，批评朝廷对外妥协苟安的政策，并另有《时议》十卷，所论“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乱”^①。他主张治天下必先之以名教，“治道之本先定，其末亦从而举矣”^②。在州县任上，他惩恶扬善，救灾赈饥，颇有政绩。这些，后来大都为曾巩所接受与仿效。在熙宁变法中，曾巩和王安石的政治分歧，就充分反映了他所受曾易占思想的影响；他在转徙六州期间对任所的治理，也实在很有其父辈的遗风的。

第三是热衷著述的风气。曾氏其实是个文学世家，其一、二、三世祖，无一不是长于著述的。曾致尧所著，据曾巩统计，“号《仙鬼羽翼》者三十卷，《西垂要纪》者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总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先大夫集后序》）。这还不包括为曾巩所褒次为集的十卷文集在内。曾巩伯父曾易简，著有《所臣事迹》、《两汉谏议》等书。叔父曾

易持，也曾任秘书省著作佐郎，和曾易占一样，也长于诗文，显然，这正是曾巩所以能成为古文大家的极重要的环境条件。

曾巩十八岁以前，除随父在如皋任所呆过一年左右时间外，基本上都是伴随祖母在南丰、南城及抚州等地，既从祖母处了解先辈的事迹，也求学于州县。这种教养，使他从小就十分关心历史兴废的教训，关心国家社稷的存亡。“合持诗书白虎论，更护日月金华居”（《寄孙之翰》）。他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勃勃雄心走向社会，去直面人生的。

迎接曾巩的，是一个政治斗争风变云幻的年代。宋王朝从其一开国，便暴露了它的软弱与无能。统治者们也想改变这种被外族贵族军事集团欺凌的局面，但他们既没有这样的魄力与胆略，同时又满足于结束五代纷争、南北辄裂后政治上的暂时稳定，与都市经济中一度出现的繁荣。对外妥协苟安，对内因循保守，以粉饰太平自欺自慰，而这正是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根源。这种贫弱之势到仁宗朝就显得更为突出了。国用窘缺，政出多门，冗官冗兵，坐糜邦用，府库匱竭，民鲜盖藏。由此而引出的一种危迫感便几乎弥漫于所有清醒的政治家们的心中，欧阳修、范仲淹、富弼诸人于此都有所论及。后来，苏轼则更生动地把它比作一个沉痾日重、郁郁寡欢的病人，“其言语、饮食、起居、动作，固无以异于常人。此庸医之所以为无足忧，面扁鹊、仓公之望面惊也”^①。

这终于导致了范仲淹的“庆历革新”，但由于触犯了大官僚贵族的利益，不到一年，革新派被诬为“朋党”，以一大批开明政治家如杜衍、富弼、韩琦、蔡襄、欧阳修等的被贬谪而告失败。这一变故，使宋王朝内部的斗争变得愈加尖锐，一方面，统治集团在政治上更趋于保守。国势也愈益危

艰，文坛上粉饰太平之风却愈加浓厚；另一方面，革新政治的思潮不但未能遏止，相反，改革呼声还越来越高。这股潮流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提倡尊孔读经，以使天下之治重归于“圣人之道”，这是打着“复古”旗号的一种改革主张。这股潮流，发展到后来，促成了宋代理学的兴起。第二是在文坛上，以欧阳修为首，力主文以贯道，革新诗文，终于廓清了空洞雕琢的西昆体的影响，造就了北宋一代极灿烂的诗文章篇。其三便是政治家们坚持改革政治法令。这股思潮发展的结果，便出现了作为北宋政治斗争最高潮的熙宁变法运动。

走向社会人生舞台的曾巩所面临的，便是这样一种既复杂又壮阔的政治局面。他意气风发，雄心勃勃。在《冬望》一诗中，他虽然很自谦地把自己比作劣马，智落豪俊之后，不似他们那样具有骅骝般的才华与风采。但其实，他所说全是反语，年青气盛的曾巩，何尝真的甘心安于“蒿莱”而不企望一踏“天路”！“嗟予计真不自料，欲挽白日之西颓”，“龙潭瀑布入胸臆，叹息但谢宗与雷”！他不愿和南朝时的宗炳与雷次宗那样，去做无意于国事的人。他童蒙时代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和所确立的政治理想，激励着他在这条道路上顽强地搏斗、奋进、沉浮、挣扎，历尽坎坷，备尝艰苦，也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二、“谁能出口献天子，一致大树凌沧波”

——坎坷蹭蹬的求仕时期

曾巩的一生是不甘落后的一生，力求有为的一生，他一直在为实现理想而奋斗。但在科举求仕的道路上他走得很不

顺利，因而也较别人经历了更多的磨难。

宋初科举承袭唐制，进士考试以诗赋和策论为主，“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④，实际上是专以辞赋取人。曾巩所习，与其时风尚不同，他长于写汉唐风格的散文而短于辞赋，屡屡落第也就势所必然了。

一〇三六年（仁宗景祐三年），曾巩十八岁，首次应试，便名落孙山。但却意外地结识了王安石，抚州与建昌两位风华正茂的才子在京城相遇了，从此结下了他们难解难分却又颇多磨难的情谊。由秋至冬，他们携手而行，客庖共食，纵论古今，砥砺文章，十分相得。分别之后，曾巩很有天各一方、惆怅何似之感慨，总期望能再次相遇，终日相处，以期得到更多的启发与帮助。

就在应试期间，曾易占在玉山令上因拒绝上司的索贿而坐诬罢官，这对本已式微的曾氏家族来说，无疑是一次极沉重的打击。它使曾巩的攻读与求仕变得更为艰苦，但同时也使他的意志磨砺得更为坚强。

一〇四一年（庆历元年），曾巩二次入京。他先去投书拜见欧阳修，带着由衷的钦佩，他表示了对欧公发自内心的仰慕之情，期望能驻足于欧公门下，以入于“圣人之堂奥家室”，去实现自己“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的秋冶理想。这中间确实也含有奔走于公卿之门以求闻达的动机，但他和枵腹之徒的钻营苟且则有显著的不同。他那种“明圣人之心”于天下的意愿与见识，在五代纷乱之后、濂洛诸儒未出之先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确乎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正迎合了当时重振儒学、尊孔读经的社会思潮，很合乎欧阳修这样一类正统古文家们的认识与主张。所以欧阳修一见便十分高兴，“爱

幸之深”，使曾巩“不敢自外于门下”。他非只将曾巩视作最得意的门生，更引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与同志，经常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对其“不以众人待之。”（《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这时的曾巩正在意气风发的时候，他的文章也“昆仑倾黄河，滂漫盈百川”^④。欧阳修既喜爱其才华与学识，也看出了他文章的不足，决心培养和疏导他。这标志着曾巩文学道路上最为关键的转折开始了。

但曾巩的仕途却依旧很坎坷，这次应试，他又一次落榜。欧阳修为此深感惋惜与不平，也为自己无力援引而叹喟：“嗟吾虽得之，气力独何弱”^⑤。曾巩南归时，他还特地作了一篇《送曾巩秀才序》，严厉抨击当时的科举制度贻误人材，高度评价了曾巩的磊落气度和思广其学的决心。

王安石却比曾巩幸运，在这次科试中及第，并签书淮南判官。曾巩和王安石又匆匆分手了。这期间，社会上一些不相悦者落井下石，对曾巩一力谤伤，南丰本土一些无知无行者也竞相奚落。这些飞短流长，曾巩在南归途中大概就有所耳闻了，但他十分坦然：“吾心本皎皎，彼诟徒囁囁”（《之南丰道上寄介甫》）。为此，王安石写了《答段逢书》为之辩诬，并断言：“吾谓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⑥。这对处于困境中的曾巩无疑是相当有力的支持与声援。

曾巩的气度是磊落的。正如欧阳修后来所追忆的，是“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⑦。他不忘告别欧公时的誓言，立志“广其学，坚其守”。一面借诸弟力学不止，一方面多次上书欧阳修、蔡襄，阐叙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形势也有一种惶惶不安的危迫感。他认为“当世之急”有三：“一曰急听贤之为事，二曰急裕民之为事，三曰急力行之事”

事”。他多次向欧、蔡等荐举王安石，认为“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不可失也。先生悦言焉进之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上欧阳舍人书》）。

不过，磊落归磊落，曾巩对自己的遭际却也有许多不平。他十分感慨自己虽矢志报国却仕进无门：

鸣鸠已安巢，飞鹄尚求树。物情限与夺，兹理奚以据？

（《南轩》）

这种怨懑与不平，使使常常借古讽今，托物兴怀。使认为自己并非肢体不全的“支离疏”，也不愿做为人灌园的於陵（陈仲子）。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如同汉的陈平那样“得宰天下”（《种园》）他借物自况，或者比作猛鸷，或者比作香橙，屡屡发出无可奈何而又充满期望的叩问：

酒酣始闻壮士叹，丈夫试用何时遭？（《一鸷》）

谁能出口献天子，一致大树凌沧波？（《橙子》）

曾巩并非不知别有投靠之路，但他生性迂阔耿介，他要“坚其守”，所以“谅知巧者劳，岂得违所赋”（《南轩》）。他不愿和一些钻营苟且者那样鄙辞厚颜去巴结权贵，“自期动即重丘山，所去何营轻糠粃”（《豪杰》）。于是，他转向圣贤之书中去寻求理趣以“广其学”，并自觉从中找到了心理平衡的支点：“久无胸中忧，颇识书上趣。圣贤虽山丘，相望心或庶”（《南轩》）。曾巩就是曾巩，使没有苏轼的旷达，也不似王安石果断，他用一种貌似迂阔的态度来表示他的耿介，表示使那“还有不同流俗处”的精神，始终显示出一种“百鸟一鸷”的傲然孤高的形象。

三、“我身今虽落众后，我志素欲希轸卿”

——家道坎壈的耕读时期

从一〇四三年（庆历三年）至一〇五六年（嘉祐元年）的十三年，是曾巩人生道路上最为困苦与凄凉的时期，但也是他性格与学业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

南归之后，曾巩一直怀念欧公与王安石，与他们诗书往来不断。他原本想北上就学于欧阳修，“然亲在忧患中，祖母日愈老，细弟妹多，无以资衣食”（《上欧阳舍人书》），他只得作罢。但困于乡邑的曾巩，其政治热情却未见减弱，他一再在给范仲淹、蔡襄等的书信中，反复申叙政治见解，表示了对庆历革新的热情与期望。庆历五年，保守派以卑劣得令人发指的手段兴“朋党”之论，革新势力遭受重大挫折。曾巩在南丰得到这个消息，“感愤痛切，废食与寝，不知所为。”悲愤中，他写了一批诗文，痛斥奸险小人的卑劣行径，以“启告觉悟天下之可告者”。他甚而声称，这也是为了“发于天子视听，有所开益”（《上欧蔡书》）。貌似迂阔的曾巩，胸中同样积压着许多不平之气。

庆历新政的失败，使曾巩的求仕变得更加无望、更加艰难而渺茫。他的家境也日见窘困：“十年万事常坎壈，奔走未足供藜藿”。一个世代书宦之家，困顿到如此地步，其清苦可知。加上南归之后，他又染上了肺病，前两年尚可勉强支撑，但到庆历六年初夏，病情就显见恶化了。严重时，甚至卧床不起。这时他依旧念念不忘事业与功名：“我身今虽落众后，我志素欲希轸卿”，“非同世俗顾颜色，所慕少壮成功名”（《初夏有感》）。此时，飞短流长大概依旧不

少，但曾巩根本无暇顾及了，他自觉沉痾日重，内心不免有了性命之忧。果然，这年秋天，肺病几乎夺去了他的生命，垂危之中，幸得一位刘姓医生精心疗治才转危为安，但却是羸弱得“握手犹惊骨骸峭”了。又加上家境贫寒，徒有四壁，他心境凄凉到了极点：“今年霜霰虽未重，室冷尚无薪可燎。一亩酸寒岂易言，侷促不殊鱼在罩”（《代书寄赵宏》）。这种处境，千古之下，都令人为之动容。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辨析。过去的研究，多以为曾巩在庆历六年也曾上京赴试。王煥燼《曾南丰先生年谱》征引欧阳修《与曾子固书》证明说：“据此书，公是年赴试亦不售”。这个说法其实是错的。欧公原书说：“虽久不相见，而屡辱书及示新文，至慰瞻企。今岁科场偶滞遐举，畜德养志，愈期远到，此卑劣之望也。”王氏“赴试不售”之说当本于此。“遐举”即远行之意，秋公所指确是科场失意的意思。但问题在于失意原因不在“赴试不售”，而是他根本就未能赴试。他在《代书寄赵宏》中回忆春上卧病时说得很明白：

“东溪最好水已绿，桃李万株红白照。当时病卧不能出，日倚东风想同调。”到五月，赵宏率师往湖南路出抚州，曾巩又作《送赵宏序》，篇末题识为“庆历六年五月□日”。八月又在抚州写了《送王希序》。而这年科试却在六月十四日，由翰林学士孙抃知贡举，奏名进士七百一十五人，题榜首者便是曾巩的一位朋友裴煜^⑨。而这正是曾巩自觉沉痾日重的时候。

曾巩未能赴试，自然又错过了一次机会。欧公的信，正是为了安慰和勉励他。欧阳修还寄来了为曾致尧所作的神道碑的文稿，所以曾巩于次年春，更以由衷的感激之情，写了《寄欧阳舍人书》以示谢忱。正是在这篇书中，曾巩明确提

出了“蓄道德而能文章”的主张，对欧阳修的文论精髓作了极精确的概括，成为后世文论中“义法说”的先声。

大约也就在这年上半年，曾易占突然接到朝廷起用的旨意^⑩，败落的家庭出现了新的希望。曾巩于是奉父进京，先至金陵，八月中旬，又自宣化渡江取道滁州拜望欧阳修，并应欧公之请，为其所筑醒心亭作记。过去因为一直以为曾巩六年曾赴试，所以此文便被认为是返回南丰后所作，这是不合事实的。曾巩这次在滁州盘垣了二十余日，又作书与王安石，邀其约期与欧相聚，书中还详细地转达了欧阳修对王安石文章的疏导意见，但因曾易占暴病而未能如愿。曾巩在滁州与欧公诗赋唱和，一再对欧公的被贬斥表示愤慨与不平。他高呼“当还先生坐廊庙，悉引万事归绳衡”（《鄜那泉石录》）依旧概露出改革朝政的强烈愿望。

这次北上，原预计次年春抵达京师。但行至南京（今河南商丘），曾易占暴病身亡。曾巩以久病初愈后的羸弱之躯而当此大难，又加盘缠耗尽，确是衰草严霜，不胜其苦。幸得当时正闲居南京的杜衍帮助，他才得以扶灵回乡，年关始至南丰。四年之后，曾巩回忆起这段经历，都仍旧惊魂未定，说是：

最自忆往岁，病躯久羸尪。呻吟千里外，苍皇值亲丧。母弟各在远，计归恐惊惶。凶祸甘独任，危形载孤惶。崎岖护旅柩，邂逅投故乡。至今惊未定，生还乃非常。

（《读书》）

经历了这场劫难，曾巩家道更加衰败，他终日为一家老小的生计而奔忙：

荏苒岁云几，家事已独当。经营众口食，四方走遑遑。一身如飞云，遇风任飘扬。（同上）

皇祐五年，其兄曾晔又去世。曾巩便挑起了抚育九妹四弟成长的重担。令曾巩欣慰的是，妹妹们都能“嫁之以时”，而弟辈们也十分勤苦，他因而也对家道的复兴充满了信心。这中间，他很得力于妻子的帮助。曾巩是皇祐二年（一〇五〇）结婚的^①。妻子晁文柔是光禄少卿晁宗恪之女。她不但操办一应家务，而且亲自为躬耕陇亩的曾巩兄弟置备饭食。曾巩后来曾十分动情地回忆这段相濡以沫的生活说：“余时苦贫，食口众，文柔食菲衣敝自若也。事姑，遇内外属人，无长少远近，各尽其意。仁孝慈恕，人有所不能及。于栉珥衣服，亲属人所无，辄推与之，不待己足。子燕私未尝见其情容；子与人居，未尝见其喜愠。折意降色，约己以法度，学士大夫，有所不能也。为人聪明，于事迎见立解，无不尽其理，其概可见者如此”（《亡妻宜兴县君文柔晁氏墓志铭》）。

然而生活的重压毕竟远远超过了曾巩的承受能力，他本来就多病，更何况大难之后又迫以贫困与辛劳，才三十余岁的曾巩竟有了“近衰境”之感，他也想效法前人的旷达，但毕竟未能摆脱抑郁的心态，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勃勃雄心与坎坷仕途的矛盾，铮铮硬骨与庸碌世俗的矛盾，“欲将志义期千载，只合溪山过一生”（《题宝月大师法喜堂》）他被命运搁置到了一个令他极为痛苦的境地。

就在这种窘境中，曾巩开始了他的耕读生活。几年之后，他置了一点田在邻邑金溪之南源，率诸弟躬耕于大山长谷之中以求簞瓢之食。耕作之余，则偕弟辈们结茅自休，力学不止，“用心于载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绪言余旨。以自乐于环堵之内，而不乱于贫贱之中”（《与杜相公书》）。数年之间，他对六艺百家、史籍笺疏、兵权历法、方言地志乃至

佛老所传，都靡不毕读。为达到“广其学、坚其守”的目的，他一是以圣贤之道作为鉴别与择取的准则，同时，又广采百家，取其精华，融合各方之所长。很快，他感到了明显的提高：“昔废渐开辟，新输日收藏。经营但娓娓，积累自穰穰。既多又须择，储精弃其穰。一正以孔孟，其挥乃韩庄”（《读书》）。所有这一切努力，都反映着曾巩自强不息的精神与意志，正如他在《学舍记》中所说：“予之劳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为之矣。予之卑巷穷庐、冗衣蓐饭、芑苳之羹，隐约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

正因为如此，这一段艰苦的耕读生活，对曾巩一生的思想与文学道路，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首先反映在思想气质方面。无论是在当时，抑或后来，曾巩在世人眼中，始终是位正统的儒者，他比同时代的任何有影响的作家都更醇于儒。他的文学思想与文章风格，都深深地打上了儒学的烙印，他后来对熙宁变法所持的态度，也充分体现着儒家教化理论的深刻影响。其次，广博的知识积累，为他后来在文学上的成功，奠定了相当雄厚的基础。尽管为生计所迫，“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但他非常勤奋，对创作，依然是“为之有不暇”（《学舍记》），因而作品也相当丰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滁州时欧公对王安石文章的不足所作的分析，给了他相当大的启发。遵照这条路子摸索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终于完成了从前期骀荡奔放向后期雍容纾徐风格的带根本性的转化，《墨池记》便是这一变化的里程碑。这一时期，是曾巩创作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他的不少优秀作品，如《寄欧阳舍人书》、《墨池记》、《学舍记》、《南轩记》、《宜黄县县学记》、《抚州穰鲁公祠堂记》等，都涌现在这一阶段。其余如书、序、墓志等，也名穰屡见。

这十三年也是曾巩政治主张渐臻成熟并开始定型的阶段。对民生疾苦的体验与了解，和欧、范、杜、蔡的交往与接触，以及他所亲睹并为之鼓呼的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他更明臻政革势在必行。他写了《本朝政要策》五十首，还仿效秦汉子书的形式，写了四辨、二论、十说等数十篇文章（见金临汾刻三十四卷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和清顾松龄刻五十三卷本《元丰类稿》所辑集外文）。这些著作，广泛地涉及到政治、历史、经济、军事、君臣关系乃至帝王修养等各个方面，较集中地反映了曾巩的政治主张。其中，有三点尤为值得注意：

一是主张先之以教化然后乃可致治。曾巩认为，求大治的根本是修先王之法度，但决不可泥古不化，而是取其根本，“先之以笃好力行之义以成其化，则其体虽大，四海九州虽广，其治不难至也”，（《为治论》）。在《说势》中他进而指出：“天下之存亡，视其大伦大法之治乱耳，其次惟所制制之，使力小而易使，势便而易治，皆善也。”以此，他就特别强调君主德行修养的作用，认为“治乱之本，在君之好恶。好恶在所习。少习也正，其长也必贤；少习也不正，其长难与共为治矣”（《论习》）。这些思想，实际上后来都成为了他变法路线与政治主张的核心内容。

其次，是御外的根本在于自治。所谓“自治”即是“自强”。在《说夷》一文中，曾巩驳斥了所谓夷狄之为病是因为未在早期“痛剪”及所谓“适当天数”等说法，一针见血地指出：“吾独以蔽生于不自治尔。”“不自治而至乎御者，其有上策乎？”他后来在熙宁变法中对宋王朝面临的险恶形势的分析，对变法的紧迫性与必要性的强调，和早期这些思想，有密切的关系。